

1938
-1946



南天藝華錄



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一八日在武漢召開抗敵演劇隊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會，圖右二爲周巍峙，右三爲張光年，右四爲左洪濤。



一九八八年十月參加演劇隊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會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部分同志在武漢合影。

參加演劇隊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會的抗宣一隊、
劇宣七隊的同志在武昌黃鶴樓前合影。



在廣州的演劇七隊部分同志與歸自美國的老隊員袁
濱及其夫人何美華（前排中立者）合影。



目 录

序一.....	阳翰笙 (1)
序二.....	左洪涛 (3)
风云雨雪八春秋.....	吴荻舟 (15)
——抗宣一队、剧宣七队的战斗历程	
沿着民族化之路开拓前进.....	徐洗尘 (71)
——忆“剧七”的民族新歌剧、歌舞剧活动	
探索创新的经历.....	范莱口述 谢虹整理 (86)
——忆“剧七”的歌剧、歌舞活动	
追寻时代的足迹.....	史进 潘予 (96)
——忆剧宣七队的话剧活动	
时代的强音.....	林韵 (100)
——记抗宣一队、剧宣七队的音乐活动	
我们用歌声战斗.....	胡振表 谢虹 (114)
——剧宣七队的音乐活动片断	
剧宣七队的美术尖兵.....	齐牧冬 胡青 (120)
话剧导演范莱.....	史进 (127)
“老将”陈卓猷.....	史进 (133)
我在抗宣一队的日子里.....	严玉文 (143)
抗宣一队桂北农村.....	陆子敏 (149)
抗宣一队战斗在南路.....	蒋湘军 (159)
难忘的一页.....	张国衡 (165)
记剧宣七队在粤湘桂巡回演出.....	张琢 (168)
回忆剧宣七队在赣南粤东的日子.....	刘望 (174)
在广州的“最后一幕”.....	集思 (180)

忆陆滨·····	白桦 (184)
忆——走过来的脚印·····	张琼 (187)
无限眷恋·····	潘予 (191)
——忆在剧宣七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我的赞颂	
——为七队及其伙伴们而写·····	何家槐 (197)
对“剧七”同志的怀念·····	李振邦 (200)
一群年青的艺术多面手·····	李门 (206)
中国新歌剧史上的一颗种子·····	李凌 (210)
——剧宣七队杂记	
祝上演·····	林路 (213)
谈新歌剧·····	林路 (215)
我协助剧宣七队演出的回忆·····	陆华柏 (219)
大胆的尝试·····	吴晓邦 (221)
忆剧宣七队的新歌舞·····	梁伦 (222)

有关演剧队历史的文献

一个罪大恶极的政治阴谋·····	左洪涛 (227)
——揭批林彪、“四人帮”对抗敌演剧七队 的迫害及其罪恶目的	
珍视革命实践中创造的艺术财富·····	阳翰笙 (238)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夏衍 (241)
我们在武汉重新聚首·····	张光华 (244)
峻岭险峰上的一丛奇花·····	刘平 (250)
——庆祝抗敌演剧队成立50周年	

附 录

抗宣一队——剧宣七队大事记·····	(253)
--------------------	-------

抗宣一队——剧宣七队队员名单.....	(265)
流动路线图.....	(271)
编后.....	(274)

序一

阳翰笙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周恩来同志亲自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批抗敌文艺队伍，深入各战区前线、厂矿、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中华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中国文坛的骄傲和光荣。

以吴荻舟同志为首的抗宣一队，后来改称剧宣七队，主要战斗在华南和西南。他们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不断进行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紧密联系广大军民群众，广泛团结爱国进步力量，战胜了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克服了战时经济的重重困难，从抗日战争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这是一支以我党革命理想和斗争策略武装起来的队伍，和其它13个队一样富于战斗力，也勇于克服生活、工作、学习上的困难和战胜政治上的迫害。

记得该队以演出歌剧、歌舞剧和歌舞为主，也演出话剧，弘扬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在西南多民族、语言复杂的地区大力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他们演出的歌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根据南方民俗改编的《新年大合唱》和七队协助桂林美专同学演出的吴荻舟同志创作、林韵同志配乐木偶剧《诗人与国王》等剧目，都引起热烈的反响。他们在实践中坚持学习，提高艺术水平。他们从缺乏专业训练的一般救亡团体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坚持战斗的艺术团。这与他们根据周恩来同志“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在艺术上、思想上不断探索追求，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该队与剧宣五队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之初，利用国民党阵营的内部矛盾，依靠地下党领导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巧妙地实现了“复员转移”到香港，保存了革命力量。这本身就是十分出色的“最后一幕”。他们后来在香港又组建成“中国歌舞剧艺社”，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受到海外侨胞的热情欢迎。以剧宣七队和五队队员为骨干的“中艺”，为革命文艺创造了新经验，谱写了艺术的新篇章。

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白了战士的双鬓，而当年晏华林集训的景象依然历历如在眼前。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如今的青年面临着建设祖国的艰巨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当然要接受世界各国新的艺术成就，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但是我们更要珍惜老一辈艺术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身的宝贵经验：坚持吸收民族传统的艺术营养，辛勤劳动，创造有民族特色的新艺术。他们为祖国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紧密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尊重祖国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按艺术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等等，永远是我们的财富。

吴荻舟同志已年逾80，还和演剧七队的同志们一起握笔撰写队史和回忆录，记述老一代文艺战士的业绩，弘扬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革命精神，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作为该队的老同志、老朋友，我很高兴地写了上面一些文字。

序二

左洪涛

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七队的前身，是抗敌宣传队第一队。这支青年革命文艺队伍，在周恩来同志倡导的文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启迪和激励下，在艺术实践上开拓创新，致力于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韵味的新歌剧、歌舞剧的演出形式和演出活动为其主要特色。这种戏剧形式，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一经革命文艺战士掌握、革新，使之进一步贴近社会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和时代一起前进，走向广阔、壮丽和优美的艺术天地，因而更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大大地增强了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个队会同其他兄弟队一起高举爱国民主旗帜，以革命文艺为武器，运用合法地位，开展统战工作，占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文化艺术宣传阵地。他们在日寇的炮火、国民党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贫病三者夹攻下，辗转战地，历尽艰险，每个队都上演过二三十个多幕剧，三四十个独幕剧，上百首歌曲。不但上演了国统区进步作家的戏剧，而且上演了解放区的戏剧；不但演唱了国统区进步作家的歌曲，而且演唱了解放区的大量革命歌曲。他们在全国各地军民心中播下的革命种子，是根深叶茂、花繁果硕的。

1940年3月下旬，我从柳州到桂林向中共中央南方局驻西南地区党的负责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汇报工作时，克农郑重地叮嘱我说：1938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并亲自向他们作了形势与任务

的报告，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武装全体成员，还亲自领导他们在武汉进行了长时间的抗敌宣传活动；同年11月9日岳阳沦陷，惊惶失措的国民党军警，秉承其最高军事当局的旨意，不声不响地把远离日寇的长沙城付之一炬。周恩来同志愤怒地谴责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当局，并立即调集八路军办事处和三厅部分人员以及抗宣一队和演剧四、五、六、九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宣慰救灾工作。上述14个队，现在还存在6个，有1个在华北，5个在西南，其中有3个在四战区。恩来同志很重视和关心他们，要我在政治上、工作上尽可能给西南地区几个队以照顾和帮助。

由于抗宣一队队长吴荻舟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曾同我在上海、南京坐过牢，我深知他在被捕、刑讯和判刑入狱后那漫漫长夜的岁月里，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是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1939年8月中旬，我随同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从韶关到桂南视察，抵达宾阳时，适荻舟参加桂林戏剧界劳军团到宾阳劳军。我们久别重逢，惊喜交集。随后回韶关途经桂林时，我专程到他家拜访，两人推心置腹，畅所欲言，难友之情，倍觉亲切！1940年初，四战区长官部从韶关迁到柳州，我们再次会晤时，获悉他于1937年“七·七”事变时获无条件释放出狱后，因没有找到被捕前党的联系人，尚未接上组织关系，但他紧跟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在工作上遇着什么困难或风险，总是找我互相切磋，共同努力克服或排除。从而我与抗宣一队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密切的工作关系。该队在柳州演出解放区的音乐作品如歌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新年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时，我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孙慎和吉联抗、黄凛等同志也热诚地给他们予以指导、帮助和支持。

抗宣一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组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配套班子。在这个班子中，主要有老成干练的班长吴荻舟和徐方

略、徐洗尘，有具有一定艺术才华的导演陈卓猷、范莱，有优秀的青年演员、歌唱家、音乐指挥、画家，还有经过一定考验的组织工作者等等。虽然有时在人事上有进有出，略有变动，但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工作始终呈现勃勃生机、蒸蒸日上的景象。

1940年8月间，两广划分为两个战区，张发奎所属第四战区，辖广西以及广东钦廉、高雷、两阳等地，余汉谋升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肇罗四邑以东地区和琼崖、赣南等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桂系白崇禧在这一反革命事变中当了“炮手”，桂林方面一时乌云翻滚，阴霾密布，八路军办事处被撤销，克农同志被迫离桂，一部分搞民主活动和文化工作的党内外知名人士，亦曾一度离桂赴港。张发奎对这次事变采取中立态度，柳州局势基本上是平静的。这时我建议抗宣一队和其它兄弟队集中柳州“整训”、“避风”。同年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舒模来到我的工作室，告知周副主席派胡家瑞来找我。胡原名何启君，1940年秋由桂林“八办”调到演剧五队工作，并负责与五、四两队党支部建立领导关系，“皖南事变”时，与四队支书陈元一起撤到重庆。此次奉命重返柳州，我们会面后，他便庄重地对我说：“周副主席决定将西南地区几个抗敌演剧队党的关系正式交给你统一领导，还有正在酝酿筹建的新中国剧社党的负责人许秉铎的组织关系，现在演剧九队支书吕复手上，由吕复转交你接管。”随即商定第二天清晨由他负责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重要指示。

是日，柳州地区风和日丽，春色融融，瞩目柳江，群峰竞险，碧波荡漾。我和胡家瑞、舒模、丁波、徐桑楚漫步到河南江边一群大石堆中，坐立于奇山秀水之间，沐浴于灿烂温暖的阳光之下，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聆听胡家瑞的传达。胡首先讲明“皖南事变”期间，四战区党组织在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对形势的估计、秘密工

作、阶级教育、气节教育，以及最近约莫三个月来的工作，周副主席、南方局表示满意，认为是正确的，有成绩的。接着，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注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派；继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时要讲究策略，应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告、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积蓄力量。恩来同志还具体指示：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并着重提示必须学会交朋友，要广交深交，开展统战工作；在党内队内，都要加强团结，刻苦学习，提高文化和业务水平，严守岗位，争取工作；同时要经常注意提高警惕，搞好秘密工作，严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突然袭击；在进行和开展工作中，必须遵守如下这条界限，即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总之一句话：不许有任何反共反人民的言行。最后，恩来同志还明确指出：第二次反共高潮基本上已被打退，我党在政治上已取得主动，争取了人心，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正处于被动地位，失去了人心；但反共逆流和投降危险依然存在，尚待继续努力克服，四战区党组织仍有可能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中断联系，为此应象以往一样，继续培养和发挥独立作战精神和能力，不要依赖中央。胡传达完后，随即商定演剧四、五两队由舒模、丁波分别负责传达，抗宣一队和演剧六队、九队以及许秉铎等则由我负责传达。

抗宣一队党的负责人徐方略等，已于1940年10月撤离该队，其他党员也由于当地党组织发生问题，党的关系没有转来，而演剧六队的情况，则与抗宣一队相似。为了加强抗宣一队和演剧六队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我便以同志式的关系，采取分析研究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方式，先后

将上述重要指示向两队队长吴获舟、刘斐章同志作了明确的系统的阐述。据我所知，抗宣一队和演剧六队从正副队长、队务会议成员，到导演、演员和其他业务、行政人员，基本上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他们的生活制度和艰苦奋斗的风尚，他们在政治、文化、艺术方面的勤学苦练和奋发进取精神，他们深入工农兵学商各界、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等等，比之演剧四、五、九队可以说是互相促进，互相辉映，并驾齐驱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主要就是通过同我们的联系，通过学习党报——《新华日报》来了解国内外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并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经过队务会议讨论布置，使之变为全体成员的实际行动。他们和其他兄弟队一样，始终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真诚地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及其直属地下党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和战斗。

就在1941年春，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张发奎将军调一个抗敌演剧队配属该战区工作，我便和获舟、洗尘商定并取得张发奎同意，将抗宣一队调到七战区。同年，该队5月到达韶关，随即改为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其他几个抗敌演剧队，亦均于此时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当出发前，我曾和获舟商量：到韶关后，首先要注意摸清七战区情况，熟悉周围环境，不要急于开展演出活动，应讲明本队由抗宣队改为剧宣队后，需要整训、学习，提高演剧艺术水平，从而争取时间，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选择一两个好剧本，排练一两个好歌剧、歌舞剧，力求打响第一炮，取得当地军民的赞赏和支持，以利于逐渐打开局面，广交朋友，开展统战工作；要认识余汉谋和张发奎有所不同，必须随时窥测政治气候，提高政治警惕，严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突然袭击，力求保存自己，做好

工作；一旦窥测到有什么风风雨雨，就立即设法与我们交流情况，商量对策，必要时，亦可采取外出巡回、流动演出或访问、宣慰演出。随后，他们就是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适当采取上述措施，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保存了力量，培训了干部，打开了局面，扩展了统一战线。1942年秋至1943年夏，剧宣七队以宣访铁路员工和四、九两战区军民的名义，从粤汉、桂柳到西江一带所进行的整整一年的大流动，就是贯彻执行上述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果的突出实例之一。

1944年2月29日，荻舟、洗尘率领剧宣七队到桂林演出，同时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桂林文化界在李济深、李任仁、柳亚子等的支持下举行的西南戏剧展览会的筹委工作，并先后演出了话剧《法西斯细菌》，歌剧《军民进行曲》，还和剧宣四队、九队（五队已调远征军工作）联合举行了歌咏大会。由于歌剧《军民进行曲》演出后，观众反映说“百看不厌”、“越听越有味”，大会特别安排在桂林公共体育场连续免费公演3天，并用广播机播送，使每场有1.3万多观众能听到。盛况空前，秩序井然，打破了多种戏剧形式的广场演出上座纪录。这次西南8省剧展，是一次精英云集、异彩纷呈、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盛会。它检阅了力量，鼓舞了士气，提高了文化艺术（特别戏剧）水平，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大西南戏剧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剧宣七队和其他兄弟队（包括新中国剧社）在西南剧展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西南剧展闭幕时，正值湘北日寇南犯，侵占长沙，进犯衡阳，蒋介石亟图把嫡系部队集中起来进攻西北解放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而对日寇的进攻采取“观战、避战”政策。由我党领导的桂林文化界又在李济深、李任仁、柳亚子等的支持下，发动了“保卫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重新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剧宣七队还会同其他兄弟队联合举行了义演活动；紧接着又先后会同其他兄弟队赶到四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柳州进行慰问演出。同年8月湘桂战局愈益紧张，我又向各队，包括新中国剧社和其他有关方面党内负责同志，传达了恩来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势任务和对撤退工作的部署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即：日寇兵力有限，战线过长，困难很多，只能占线，不能占面，也就是说只能暂时占领湘桂铁路沿线几个城市，不能占领广大农村。我们的同志，包括进步分子，凡年纪轻、身体好、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应尽可能留在敌后联合当地一切爱国人士，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要都往大后方跑；一些高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包括党内同志在内，凡年事较高、身体不好的，一定要协助他们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如交通或生活方面确实有困难的，应尽可能帮助解决。根据此指示精神，我催促荻舟赶快把队伍带回粤北。这群热血沸腾的革命文艺战士风华正茂，个个豪情满怀、壮志凌云，当即从柳州出发，中经韶关、坪石、南雄、大庾、赣州，接着又由三南越过九连山步行到兴宁、梅县，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不顾道路崎岖，荆棘丛生，历尽艰险，长途跋涉，进行巡回宣传动员、组织培训和演出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1月下旬，剧宣七队回到韶关。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投降后头几个月，由于还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尚未运到内战前线，全国人民又坚决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反对独裁、内战，为了欺骗群众，缓和舆论，便玩弄其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阴谋，“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相继遭到破坏。也正于此时，蒋介石通过美帝国主义为他装备了45个师，运输了55万军队到内战前线，准备彻底破裂，全面内战。恩来同志又及时指示各个剧宣队争取留在大城市工作，配合民主运动，扩大社会影响，严防政治迫害，坚持不到反共前线。当时正在韶关的剧宣七队遵照恩来

同志的指示，拒绝随同七战区司令部到华东反共前线，正在昆明的剧宣五队也遵照恩来的指示拒绝到华中五战区司令部反共前线，并由我征得张发奎同意于1946年春先后调来广东配属广州行营。随后这两个队便迅即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战斗，并在南方戏院连续两月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出。由于他们高举爱国民主旗帜，采取有歌、有舞、有剧的演出方针和演出形式，舞台上异彩缤纷，激励斗志的歌曲不绝于耳，绚丽多彩的舞姿目不暇接。从当时来说，每个节目包括话剧在内，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强，都相当新颖、精彩，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效果很好，影响甚大；但却遭到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省党部反动首脑的疯狂压制和迫害。1946年5月4日，广州市广大青年学生、教职员、工人、市民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举行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的示威游行。也就在上述这伙法西斯党徒的策划和指导下，以省教育厅长、市公安局长、机器工会工贼头目为首率领大批流氓、特务、军警对示威游行队伍进行血腥镇压，一些进步组织和进步文化事业如兄弟图书公司，华商报、正报办事处，随即遭到严重摧残；云集在广州搞和平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党内知名人士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威胁，在广州的剧宣七队、五队、新中国剧社一部分人员，以及我党地下组织广州行营中共特别支部成员也遭到疯狂的攻击和迫害。为此我便在出敌不意、乘敌不备的情况下，在南溟老（李章达）寓所邀见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廖承志同志。我问承志：“近来形势恶化，处境艰险，关于我们的去留问题，中央有何指示？”承志同志对我说：“你们的事情是周副主席亲自管的，周副主席现在上海，赶快设法到上海请示周副主席。”我立即和我们特支杨应彬、郑黎亚同志商定，由我将上述情况写个书面报告交黎亚用密方抄好，商请广州行营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地下党员）飞赴上海送呈恩来同志核示。恩来同志鉴于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卖国、独裁、内战，我们处境愈益艰险，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再战，当即复示：“相机撤退”。我随即向各有关方面党的负责人张兆汉、陈彬、司马文森、郑思、周钢鸣、华嘉、何明、黄新波、狄超白、张铁生、吴荻舟、徐洗尘、胡振表（此时七队党的关系已由李嘉人、饶彰风同志转到我处）、徐桑楚、丁波，以及我们特支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关于剧宣七、五两队的撤退问题，我邀集两队负责同志在我的住所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为了不影响其他兄弟队和有关的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决定撤开蒋之嫡系军统特务黄珍吾，直接向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提出集体复员回家的要求和原由，诸如男婚女嫁、奉养父母、升学读书等等。为达到此要求，我便首先同一位亲密的盟友——行营中将高级参谋、办公厅主任高若愚商量，请他先将两队的要求提出来同张发奎主任谈谈。高欣然应允，并向张阐明：“这些男女青年从小出来跟你团结抗战，现在日本已经投降，应让他们复员回家，好来好去，各奔前程，各安生计”。张表示“完全赞成，让他们集体复员，好来好去，并保证不伤害在广州的文化界人士任何一个人。”随后，我就拿着两队要求复员的报告陪同两队负责同志去见张，并向张反映黄珍吾不让两队复员的情况。张当即答复：“你们不要管他，我批准两队复员，发给两队复员费。”同时同意我的建议请两队聚一次餐，开个告别晚会。张发奎将军及其夫人刘景容女士和行营一大批高中级官员参加了聚餐和告别晚会。在晚会中，当两队代表朗诵一首“面幕颂”告别诗时，张及其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坐在背后的黄珍吾气急败坏，喃喃自语：“不能放虎归山呀！”张转过身来，横眉冷对，严加训斥：“你胡说八道，你想干什么？”黄立即站起来，俯首贴耳：“报告主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我绝对服从。”无可奈何花落去。翌日，他悻悻然飞往南京向其